

流氓政治及張鐵生現象

●王毅

合既然不斷給知識階層帶來深重的災難，那麼為甚麼知識階層又不得不始終積極參與、促進着這種結合？甚至許許多多像馮友蘭那樣的碩學之士，都不得不在流氓江青等的驅使下投身於「批孔」的鬧劇？

余英時先生〈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二十一世紀》第2期）一文中提出的流氓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中的地位，流氓、權力中心、知識階層三者的關係等問題，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點只要從「文化大革命」時陳阿大、張鐵生之流的騰達給億萬人民，特別是中國知識階層帶來的深重災難（而這一災難至今遠未被深刻認識），即可窺見一斑。但是，余先生對產生諸如此類現象（我稱之為「流氓皇帝現象」和「張鐵生現象」）之根源的論述，竊以為是可以商榷的。具體地說，（1）「流氓皇帝現象」和「張鐵生現象」是否僅是或即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不斷「革命」、「破舊立新」的結果，抑或另有更複雜、久遠的根源？（2）為甚麼在中國的政治結構中，流氓極易與國家權力相結合，甚至融為一體？社會機制為甚麼要在金字塔的最頂層與最底層之間建立這種密切的、經常性的聯繫？（3）在幾千年的專制政治史中，流氓與國家權力的結合既然不斷

給知識階層帶來深重的災難，那麼為甚麼知識階層又不得不始終積極參與、促進着這種結合？甚至許許多多像馮友蘭那樣的碩學之士，都不得不在流氓江青等的驅使下投身於「批孔」的鬧劇？

對於秦漢以後的國人來說，流氓（更多的是各階層中富於流氓性的人物）發迹，甚至於爬上皇帝的位子，實在是早已司空見慣的。要從敵手那裏分得自己父身之肉羹的劉邦，大概是牌子最老而正的一位。劉邦的衣鉢被後來無數大大小小的逐鹿者世代襲用，有名的例子如曹操骨子裏即是「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的流氓胚，他靠了欺罔父親、誣詆叔父而騙得恣肆放縱的機會，更活現出流氓的品性（詳見《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及裴注引《曹瞞傳》）。後來的問鼎者們當然難有曹操的才學，然而其行止卻往往驚人相似。例如宋武帝劉裕，發迹之前也是十足的流氓（《魏書》卷九十七〈島夷劉裕傳〉）。



圖「流氓皇帝現象」與「張鐵生現象」有着久遠的、複雜的歷史根源。圖為「白卷英雄」張鐵生。

流氓皇帝們的成功，其更廣泛的意義在於對無數覬覦者的鼓勵，在於為社會劣根性的膨脹和傳染不斷注入着活力。為了保住到手的皇位，一個流氓皇帝可以殺掉千百個想當皇帝的流氓，然而新毒瘤的孽發卻始終與這種專制政治的機體同生共榮。例如南朝最殘暴的統治者宋明帝為了防人篡位，大肆殺戮宗室和朝臣，而他倚重的工具，即是一批日漸貪婪酷虐的倖臣豎夫。這些人出身於文化層次最低的社會底層，然而專制制度的需要，却使他們在轉瞬之間有了與劉邦、曹操為伍的資格。

流氓政治與君主專制始終相互依存的原因

「流氓皇帝現象」與「張鐵生現象」有着久遠的根源，這幾乎不需要甚麼證明。從劉邦到朱元璋；從發迹前一如家奴的高俅（詳見王明清《揮塵後

錄》卷七「高俅本東坡小史」條），到「少無賴，與群惡少博，不勝，為所苦，恚而自宮」的魏忠賢（《明史》卷三百五《魏忠賢傳》），人們對於這一切太熟悉了。而我們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為甚麼長期穩定、並以禮義廉恥、恒產恒心、宗法倫常、科舉官制等等因素高度完備發達為標誌的中國古代政治—文化模式，竟會允許、需要流氓這種品質、地位、活動地域皆極不穩定的階層存在？甚至要把這個最卑劣、對社會和文化戕害最烈之階層的代表人物，經常推升到權力金字塔的絕頂？

秦漢以後延續兩千年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體系之所以能夠在那麼漫長的歲月中，始終保持着總體模式和基本價值取向的穩定性，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體系孕育出了廣泛普及和盡可能公平的科舉制度、嚴整有序和高度發達的文官制度，隋唐以後這些制度更趨成熟。科舉和官制的成熟穩定，其基本目的在

於保證官吏的選拔和政務的處理程序最大限度地與大一統集權制度的整體利益相契合，而不是以這一制度中某一個人（哪怕是皇帝）或階層的利益為出發點。如果沒有這種維繫各利益集團關係的共同原則，大一統政治—文化結構就將解體。所以社會機制也就必然把科舉、官制、政務等的上述有序局面，視為具有永恒價值的常規形態，並以此實現對流氓政治膨脹的有效制衡。

但是另一方面，與維繫大一統體系中各階層的共同利益和相互平衡相對應的，這一切政治的運作是以皇權的啟動、干預為前提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把中國幾千年君主政治總結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功」，即是對上述悖論的深刻說明。因此每當常規形態下的運作無法充分保證君權專制的延續時，非常規的補充形態就會被啟動。與維繫君權這一根本目的相比，手段的選擇永遠是從屬的。其實，早在大一統制度誕生伊始，這種補充效用就被設計好了，所以《韓非子·難三》對只知「尊賢以崇德」的孔子、子思等人着力批評了一頓，最後歸結在：「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

不難發現，流氓政治的盈縮是與整個政治局面隆替的周期相匹配的。鹿失鼎革的天時歷來給流氓們以一逞其術的良機，這無須費辭。要說明的是一朝一代之內的興衰與流氓政治互為因果的關係。齊桓公任用背親以詭主的易牙等人卒致身死國亂，是宵小專權很早的例子，但從中已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最高權力階層內部固有的紛爭拼殺，為流氓政治的膨脹提供

了基礎。（詳見《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以後的帝王們並非不知殷鑒，他們也沒有忘了告誡子輩：「毋邇宵人，維法維則！」（《史記》卷六十《三王世家》）然而「宵人」這永遠割不盡的毒瘤却始終伴隨着專制制度而延續。流氓政治膨脹與專制政治發展的同步性，可以通過比較看得很清楚。《史記·佞幸傳》和《漢書·佞幸傳》所列寵臣在政治上的作用還極為有限，但到了南北朝，獨裁專制與流氓政治間必然聯繫就已是怵目驚心了。當然包括豢養流氓無賴在內的所有這些千年前的古法，怎樣以更殘酷的形式和更巨大的規模被繼承弘揚，凡是經歷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運動的國人都不會忘記的。

為甚麼不僅「姦雄」發迹成了帝王史的主幹，而且那些為「亂臣賊子遞相承襲」的詭詐手段，非但沒有在「昭德塞違」的聖賢之道面前敗下陣來，反而不斷被弘揚完善，竟而光明正大地成為以後歷代支撐整個政治體系的官制制度。的確，如果我們不能站在文化的深層回答這個疑問，也就不可能明白，為甚麼甚至在千百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時，上述傳統依然被恪守不移，以至於「翰林學士院」（中央文革小組）重又成為「專掌內命」、至高無上的權力機構，而「天子私人」又再權傾天下了。

流氓政治與知識階層的命運

有關古來中國知識階層命運的問題固然極為複雜，但借一個例子，也未必不可以概括得很簡單。荀伯玉作為謀主，竭其全力幫助齊太祖蕭道成奪了劉宋的天下，但這位佐命元勳後

流氓政治的盈縮是與整個政治局面隆替的周期相匹配的。正是最高權力階層內部固有的紛爭拼殺，為流氓政治的膨脹提供了基礎。

為甚麼甚至在千百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時，流氓政治的傳統依然被恪守不移，以至於「翰林學士院」（中央文革小組）重又成為「專掌內命」，至高無上的權力機構。

來卻見誣伏誅，時人嘆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南史》卷四十七《荀伯玉傳》）能為帝王們謀天下而不能為自己謀一身，拿這樣沉痛的話比喻兩千年間知識階層的命運並不過分，因為只要「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千年古法不打破，知識階層對於生活道路、人格理想、宇宙觀、思維方式等等一切重大問題的選擇，就早已被整個文化—政治結構限定好了，他們自己決沒有超越這限定的可能。而他們與流氓政治的關係當然也不能例外。

余英時先生說：知識分子鼎力幫助流氓惡棍升入政治中心。結果反而使原來在社會上舉足輕重的知識分子靠邊站了。余先生所說的這一重要現象，是很值得做一點兒辨析的。

烏盡弓藏 自古已然

首先，上述現象不僅不始於二十世紀，而且其歷史幾乎與中國的君主專制和流氓政治同樣悠久。以流氓曹操、劉裕為例，他們之所以能夠稱帝稱王，當然仰仗着謀主荀彧、劉穆之的盡心輔佐，劉裕甚至連字都寫不好，以至需要劉穆之耳提面命地教他遮醜的辦法。然而這兩位功侔伊呂的肱股（荀彧還是出身於當時最富文化傳統的高門）之結局卻一致得驚人：都是因為對流氓發迹之後，是否應該馬上再去搶「九錫」略有躊躇，結果惹得其效命之主轉瞬間翻了臉，於是荀、劉二人也就被活活嚇死。（詳見《三國志》卷十《荀彧傳》、《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同卷《王弘傳》）一次沒有被嚇死的讀書人如果依然「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曹操對付他們的辦法就是「設

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見曹植《與楊德祖書》，《文選》卷四十二）恰如「反胡風」之後連成一串的「反右」和「文革」。與曹操相類且最有名的例子，大概是流氓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後，借口胡、藍謀反而大殺公卿，連一代名儒宋濂等亦不能幸免。朱元璋還從此永廢宰相制度以進一步扼制知識階層，更妙的是他施暴時的振振有詞：「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詳見《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胡藍之獄》）流氓做了皇帝之後，士大夫們反倒成了宵小和禍水，所以對他們的一切屠戮和凌辱都是國運民命之所必需，這種邏輯真成了中國專制主義和流氓政治歷久彌珍的傳世之寶。

知識分子角色的被動性

第二，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體系中，知識階層的「在社會上舉足輕重」與否，永遠是被動的，永遠取決於整個體系的需要。早如《慎子·佚文》中就有「無賢不可以無君」斷語，戰國是禮賢下士的時代，然而那時的思想家就毫不猶豫地讓「尚賢」去做「尊君」的奴婢，秦漢以後的情況就可想而知。所以，東方朔慨嘆士人命運之由人擺佈：「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答客難》，《文選》卷四十五）帝王們對士大夫榮辱的予奪還經常與其對科舉官制的駕馭融貫為一，如北魏道武帝說：台輔之職「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舍之則輕」（《魏書》卷二《太祖紀第二》）；這當然更從具體制度上規定了士大夫命運的被動性。也正因為這種天生的被

流氓做了皇帝之後，士大夫們反倒成了宵小和禍水，所以對他們的一切屠戮和凌辱都是國運民命之所必需，這種邏輯真成了中國專制主義和流氓政治歷久彌珍的傳世之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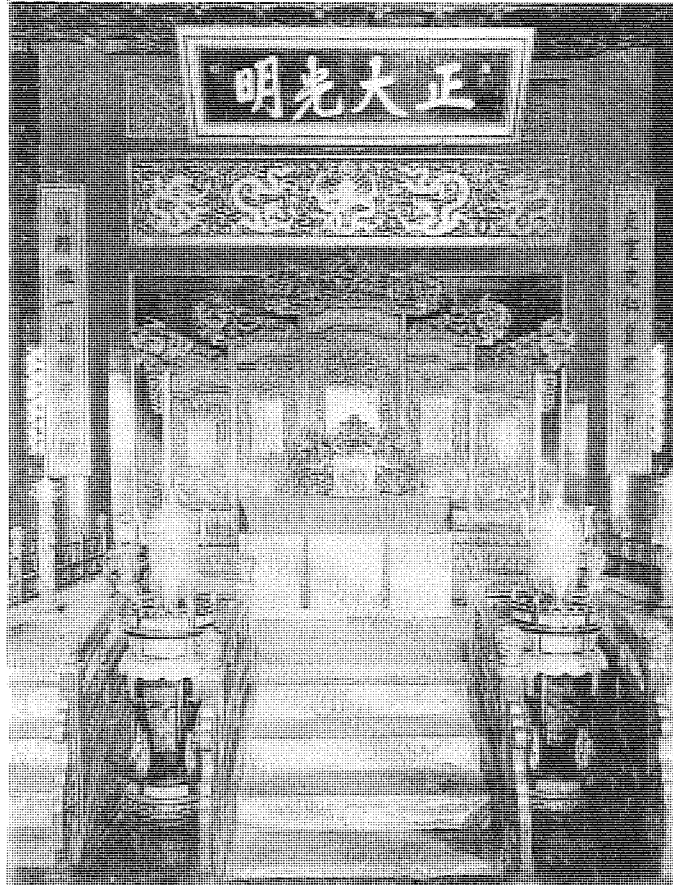


圖 清圓明園正殿名為「正大光明」，紫禁城乾清宮御座之上高懸「正大光明」匾額，然而流氓政治卻並沒有絕迹。

動性，所以儘管知識階層由於整個體系的需要而經常被置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在傳統文化模式中，這個階層永遠不可能在制度需要的限度之外，對包括流氓階層在內的一切惡勢力有更多的觸動。東漢後期知識階層在與宦官的對抗中非但沒能打垮對手，反而招致黨錮之禍，即是一例。

知識階層的內部傾軋

第三，知識階層不僅作為一個整體而與其外部的流氓政治相互制衡消長；而且知識階層內部亦必然分化出分別代表常規與非常規社會形態的矛盾力量。當我們讚嘆知識階層對聖賢之道的執着時，就不應忽視同在知識階層內部滋生着對「道」的銷蝕劑；而

當我們注重士大夫「為生民立命」的崇高人格理想如何升華了整個民族的價值追求時，同樣不應忘記：知識階層內部的非常規因素也必然要與整個社會機體中的流氓政治等非常規因素相互滲透和激活，不應忘記這種相互滲透和激活對整個民族極大的戕害。這種「共振」可舉明代許多士大夫爭相黨附流氓出身的魏忠賢為例，《明史》卷三百六《閹黨列傳序》曰：「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至劉瑾竊權，焦芳以閹臣首與之比，於是列卿爭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內閣上。迨神宗末年，訛言朋興，群相敵讎，門戶之爭固結而不可解。……莊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

付大學士韓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知識階層對惡勢力的獻媚，在後來的「批胡風」、「文革」中再度成為最醜惡的現象之一。

從淵源上看，流氓政治可以上溯到戰國的縱橫術，而秦漢以後知識階層與縱橫家的傳統又總是若離若即，宋代儒學家把「士大夫無恥」作為應全力矯治的「時之大弊」，（見石介《上孔中丞書》，《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三、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死事傳序》、《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傳序》、《宋史》卷四百三十八《黃震傳》等）然而險陂無恥的新流氓卻依舊不絕於儒門。所以王安石雖然對孟嘗君及其雞鳴狗盜之徒極為鄙夷，但他依仗的卻偏就是「詭變多端，敢行非度」的呂惠卿，以至於最後連自己也被呂氏作為「甚於仇讎」的死敵而傾陷出賣。（見《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呂惠卿傳》、卷三百三十九《蘇轍傳》）更典型的例子則如蔡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梏之。」（見《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蔡京傳》）正是因為有了政治—文化體制深層的這種需要，「任權者以傾巧為賢」（陳子昂《上軍國機要事》，《陳伯玉文集》卷八）的弊政才會始終伴隨着專制政治的發展，而知識階層內部的流氓政治也才有了立腳和膨脹的根本。所以後來變本加厲地有了清康、雍帝鼓勵士大夫暗中相互監視並向皇帝告密的密折制度，以及晚近更加喪心病狂的全國知識階層間的大揭發、大批判。一位老作家說（蕭乾《北京城雜憶》，頁113—114）：

長時期（尤其「文革」期間）縈繞我腦際的一直是這麼個題目：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問題，或者說，一時佔上風的少數知識分子，怎樣利用工農幹部來迫害其他知識分子。……許多往事都使我深深感到，即使是在文革期間，真正的工農也仍是善良的。少數知識分子整起旁的知識分子來，才手毒心狠呢！

本是同根生的知識階層，他們的內部關係何以成了「你死我活」？何以用「手毒心狠」的流氓政治相互傾軋了幾千年？這的確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結語

余英時先生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中，論述了中國專制主義政治傳統的始終延綿不絕，最後以一句十分沉痛的話結束全文：戰國至今「二千三百年之間，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以此警策之語作為本文的結束當然也非常恰當，也許這樣說更周詳些：二千三百年之間，堯舜周孔之道與流氓政治始終相反相成，二者皆未嘗一日獨行於天地之間也。

1991年2月

王毅 1954年生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畢業，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著有《園林與中國文化》及學術論文數十篇。

知識階層內部的流氓政治，後來變本加厲地有了清康、雍帝鼓勵士大夫暗中相互監視並向皇帝告密的密折制度，以及晚近更加喪心病狂的全國知識階層間的大揭發、大批判。